

北方草原地区发现的隋唐与西方风格的金银器

□ 张景明

隋唐时期,在北方草原地区活动的民族有突厥、回纥(回鹘)、契丹、室韦、奚、靺鞨等,以突厥和回纥为主,在他们的遗迹遗物中,金银器占有一定的数量。这一时期,随着草原丝绸之路的逐渐繁盛,中西文化、南北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并在金银制品中充分地表现出来。从现有出土的北方草原金银器看,既有北方民族的产品,又有粟特、古罗马、波斯萨珊等西方风格的金银器,还有数量较多的唐代风格的金银器。因此,对隋唐时期在草原地区出土金银器的分析研究,将会丰富学术界对北方草原金银器和草原丝绸之路发展历史的认识。

一、北方草原金银器的造型艺术

北方草原地区隋唐时期金银器中的生活器皿,器口变化较多,有圆口、花瓣口、椭圆口和流口,圆口和花瓣口占多数。花瓣口分四瓣和六瓣,器形有盘、盆、杯。圆口器有壶、杯。腹部变化也较多,分鼓腹、球腹、长弧腹、弧腹,高足杯的腹较深,出现了仿生器形。圈足发达,还有平底、三足。

纹样分动物纹、植物纹和生活场面,还有联珠纹、鱼子纹。动物纹的种类有龙、摩羯、狮、狻猊、鹿、喜鹊、鸳鸯、雁、鸟、鱼、鳄鱼等(图一)。龙纹只体现首部,采用圆雕的技法,眼鼻突起,龙须卷曲,造型生动活泼。摩羯纹较为普遍。鹿的造型以瑞鹿形象出现,头顶长肉芝,肩生双翼,象征吉祥如意。植物纹的种类有牡丹、石榴、葡萄、蕉叶、菊花、梅花、卷草,以牡丹和卷草居多。生活场面只见狩猎情景,如内蒙古苏尼特右旗布图木吉^[1]出土的金鞞蹀带,在尾上饰狩猎纹,猎人骑马张弓搭箭,追射猎物。联珠纹饰于生活器皿的肩部、腹底间、足缘,起装饰和隔离图案的作用。鱼子纹

作为器物的地纹,起辅衬的作用。

生活器皿的纹饰布局讲求构图对称,纹饰繁缛而层次分明,多以团花形式出现,采用环带夹单点式装饰和散点式装饰。环带夹单点式装饰,只在器物内底装饰图案,其他部位空白。如内蒙古博物院收藏的鎏金摩羯纹海棠形银杯,内底心镌刻游动的摩羯,以海水为地。散点式装饰,除在器物内底饰主体图案外,还在沿、腹上饰一种或多种重复出现的纹样,且讲求对称。如内蒙古喀喇沁旗锦山镇河东村窖藏^[2]出土的鎏金摩羯团花纹银盘、鎏金雄狮团花纹银盘、鎏金卧鹿团花纹银盘和鄂尔多斯青铜博物馆收藏的鎏金摩羯纹银盆,后者内底心镌摩羯戏珠,以海水为地;内沿镌一周花卉纹,腹部镌相间的双鸳鸯衔绶纹和双



图一 鎏金双鱼形银壶,唐代,内蒙古喀喇沁旗锦山镇河东村窖藏出土



图二 鎏金“裴肃进”双凤纹银盘，
唐代，陕西省西安市北郊坑底寨出土



图三 鎏金卧鹿团花纹银盘，
唐代，内蒙古喀喇沁旗锦山镇河东窖藏出土

飞雁纹。

满地装的构图，见于生活器皿和装饰品上。如内蒙古喀喇沁旗锦山镇河东村窖藏出土的鎏金鹿纹银罐、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墓葬^[1]出土的喜鹊闹梅纹银钏，在器表满饰纹样，显得十分华丽。从工艺看，以锤鍍为主，錾刻、铆合、切削、抛光、鎏金、镂空、掐丝、焊接等技术，使用十分普遍和娴熟。

二、北方草原金银器的隋唐文化因素

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下卷五金、银条记载：“凡土内银苗，或有黄色碎石，或土隙石缝有乱丝形状，此即去矿不远矣。凡成银者曰‘礁’，至碎者曰‘砂’，其面分丫若枝形者曰‘铆’，其外包环石块曰‘矿’。矿石大者如斗，小者如拳，为弃置无用物，其礁砂形如煤炭底衬石，而不甚黑。其高下有数等，出土以斗量，付与冶工，高者六、七两一斗，中者三、四两，最下一、二两。”古代采掘金银矿的方法，基本上是按照矿石的形态进行的，这里指出了矿石中含银量的多少。北方草原地区发现的唐朝风格的金银器，也离不开这种开采、选矿的基本方法。

考古学资料表明，从目前已经发现出土的唐朝时期金银器的遗迹看，主要集中于中原地区、南方地区和北方草原地区。其中，北方草原地区发现的金银器主要来自于唐朝和西方国家，自己产地的制品非常少。唐朝境内的金银器，产地有两大块，即以长安和江淮地区为中心。盛唐以

前，长安地区成为制作金银器的中心地。盛唐以后，随着北方战乱的兴起，唐朝的经济重心南移，江淮地区便成为盛产金银器的中心地。唐代金银器制作可分为三个时期：公元8世纪中叶以前、8世纪中叶至8世纪末和9世纪。器物的形制特征、制造技术、纹样风格等表明，早期受中亚、西亚的影响较大，中期形成了中国独特的风格，晚期进一步发展。唐朝金银器的空前发展，其原因是当时经济繁荣，金银产地和产量增加，冶炼、工艺、装饰达到了新的水平，为金银器制作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亚、西亚传统的金银工艺技术对唐朝产生了影响，促进了这门手工业的发展；皇室贵族追求奢侈生活，并以金银器作为赏赐、行贿、供奉和对外交往的物品，增加了社会的需求；唐朝在中央官府专门设置了作坊和管理机构，促进了金银器的发展，保证了质量的提高。

内蒙古喀喇沁旗锦山镇河东村窖藏出土的三件鎏金银盘的形制和纹饰布局，与陕西省西安市北郊坑底寨^[4]出土的“裴肃进”鎏金双凤纹银盘、（图二）蓝田县杨家沟^[5]出土的鎏金鹦鹉团花纹银盘、西安市南郊曲江池村^[6]出土的折枝团花六曲三足银盘和日本正仓院收藏的鎏金鹿纹三足银盘^[7]相似，为六曲花瓣形，在内沿、腹、底錾刻纹样，呈对称团花布局，鹿的头顶上长肉芝，但日本正仓院收藏的银盘上的鹿纹没有生翼，姿态也不相同。从鎏金卧鹿团花纹银盘的底部铭文看，为唐德宗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年）担任

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宣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使刘赞向朝廷贡献的物品,说明为江淮地区的产品,后来朝廷又赏赐给边疆少数民族的上层贵族,传入北方草原地区(图三)。唐代金银器不仅是贵族豪华生活中的重要用品,而且皇帝也用于颁赐臣下及民族交往,大官僚为了得到皇帝的宠幸,还用金银器作为进奉之物,所进金银器还要刻上官衔姓名,陆续发现的有裴肃、李勉、刘赞、敬晦、田嗣莒、李杆等结衔署名的金银器,均属向皇帝进奉之物。有时皇帝还向各地下令宣索,使地方官吏不堪其扰。唐朝宝历元年(825年)七月,敬宗李湛要浙西造银盃子妆具二十事,浙西观察使李德裕说:“金银不出当州”、“今差人于淮南收买。旋到旋造,星夜不辍,虽力营求,深忧不迨”^[8]。在唐德宗时期,进奉成风。《册府元龟·帝王部·纳贡献门》贞元十二年(796年)条注:“兴元初,克复京师后,底藏空虚,诸道之有进奉,以资经费,复时有宣索。其后,……进奉不息。韦皋剑南有日进,李兼江西有月进,杜亚扬州、刘赞宣州、王纬、李绮浙西皆竞为进奉,以固恩泽。……天下贡赋根本,既出江淮,时江淮人甚困,而聚敛不息。”《旧唐书》卷136《刘赞传》记载:“宣为天下沃饶,赞久为廉察,厚敛殖货,务贡奉以希恩。”在西安市北郊坑底寨发现的“裴肃进”鎏金双凤纹银盘底上,篆刻“浙东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大中大夫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金鱼袋臣裴肃进”的铭文,陕西省耀县柳林背阴村窖藏^[9]出土的银盘,篆刻“盐铁使臣敬晦进十二”铭文,据《旧唐书》、《新唐书》等文献考证,敬晦于唐宣宗大中年间(公元847-859年)先后任御史中丞、刑部侍郎、诸道盐铁转运使、浙西观察使等。说明这几批金银器都是唐朝江浙地区的产品。在北方草原地区发现唐代风格的金银器,反映了唐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盛况。

从金银器的制作工艺看,突厥人“工于铁作”,金属的冶炼、制作是其经济振兴、政治强大的重要基础。在新疆阿斯塔那出土的高昌国接待外国客使和客商的“供食”文书中,保留有为阿波可汗派来的“铁师”提供食物的原始记录。在出土的一件“供食”文书中,记录了贪汗可汗的“金师莫畔陀”曾出使高昌,在供食文书中列入上等供

食等次^[10]。说明了“铁师”在突厥社会中享有很高的地位,他们不但擅长金属的制作工艺,还可能担任管理金属手工业制作的职官。由此也能看出突厥的金银器有相当数量是自己制作的。中外史籍中记载了很多突厥人使用金银器的场面。公元570年,东罗马使臣在大帐中谒见室点密可汗时,“见其坐于两轮金椅上,行时以马驾之,帐幕以杂色绸绢饰之。”“可汗当时接见罗马使臣之二室,其一中有肖像,可汗卧于金床,四金孔雀负之,门首有车,满载银盘及银制动物肖像。”^[11]唐代高僧玄奘记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居一大帐,帐以金华装之,烂眩人目”。可见,突厥贵族在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金银器,显示出他们对金银器的喜爱。新疆昭苏县^[12]出土的金银器,为隋唐时期的西突厥遗物。从考古学资料证实了突厥人使用金银器的历史事实。

在隋唐与突厥的交往过程中,突厥经常向隋唐贡金银器。《隋书》卷15《音乐志》下记载,公元610年,“诸夷大献方物,突厥启民(可汗)以下,皆国主亲来朝贺。乃于天津街盛陈百戏,自海内凡有奇伎,无不总萃,崇侈器玩,盛饰衣物,皆用珠翠金银锦罽絺绣,其营费亿钜万。”《隋书·本纪》记载,公元591年突厥遣使献七宝碗。《册府元龟》卷520记载,贞观四年(630年),李靖破颉利牙帐,突厥珍物,累亿万计,多请取之。隋唐政府还向突厥贵族赏赐金银贵重物品。《隋书》卷84《突厥传》记载,隋炀帝幸启民住所,“帝赐启民及主金瓮各一及衣服被褥锦采,特勤以下各有差”。《阿史那忠碑》记述了忠曾受“赐金银器物数十事”。《契苾明碑》记载契苾明受“赐锦袍、宝带、金银器物、杂采绫锦等数千件”。《册府元龟》卷974记载:“突厥支匐忌等来朝,帝亲临宴赐金银器物、锦等有差。”《册府元龟》卷975记载,开元二十二年(734年),“突厥遣其大臣斯壁纥思来朝,赐紫衣、锦袍、绣半臂、金钿带、鱼袋七事,金银器六事。”类似这样的记载很多,可知突厥通过贸易、接受赏赐和战争掠夺,获得大量的金银制品。公元6至7世纪,雄踞西域的突厥人对西域诸国及中亚地区的豪夺,是其金银奇宝敛聚的重要途径。在突厥汗国刚立国之后,击灭茹茹,占据嚧哒旧地,扩张势力至罽宾,后以室点密为西面



图四 银执壶,唐代,
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墓葬出土

可汗率部占据中亚绿洲,粟特城邦都纳贡称奴。盛产金银器的粟特地区便成为被奴役的对象,以至于在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发现粟特银器,这是突厥人掠抢而来的银器,与史籍和突厥文碑记载的史实相符。正如《墩欲谷碑》所说:“他们运回了‘无数的黄金、白银、姑娘和妇人、贵重的鞍鞞、珠宝’。可见,突厥通过战争而四处掠抢成为其金银器的一个主要来源。

三、北方草原金银器的西方风格

唐朝时期,与西方发生文化交流的国家或地区有贵霜、嚧哒、突厥、萨珊、拜占廷、粟特、大食等,都是制造金银器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对唐代金银器有较大的影响。当时,草原丝绸之路处于繁盛时期,许多西方的金银器和制作技术就是通过这条通道抵达草原地区,并南下传入中原地区和南方地区。同样,中原地区和南方地区的金银器也通过唐朝政府的赏赐、赠送等手段进入北方草原地区,并经过草原丝绸之路将唐文化传播到西方国家。因此,在北方草原地区发现了西方特征的金银器。

内蒙古李家营子墓葬^[13]出土的银执壶、鎏金犴犵纹银盘、椭圆银杯,是唐朝时输入的粟特银器。粟特地区处于中西交通的枢纽,中国和西方国家的交往许多情况下是通过粟特人进行的,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发现粟特金银制品反映了这

种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状况。银执壶,口部有流,弧形把,把上端与口缘相接处焊一胡人半身像。这类壶在中亚、西亚可以见到,一般认为是波斯萨珊遗物^[14]。该壶的把上端直接安在口上,颈部粗短,圈足矮胖,没有节状装饰,底沿绕足饰一周联珠纹,风格更接近于粟特的产品(图四)。椭圆银杯,不分瓣,也不带耳,形制特别,与萨珊和我国中原地区的长杯有所区别,形制更接近于粟特长杯。在中亚撒马尔罕的片吉肯特的粟特壁画^[15]中,有许多人物手持这种长杯进行饮宴。折肩银罐,腹部有环形把,把上附椭圆形指垫,其风格与西安市何家村窖藏^[16]出土的带把杯和俄罗斯埃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的带把杯一致。这种带指垫的制作手法,是粟特银器极富特色的装饰,几乎每一件银杯上都能见到,故为粟特的产品。鎏金犴犵纹银盘,在盘内底心饰动物纹,周围留出空白,这种做法在粟特地区盛行,当为粟特地区的产品。从李家营子墓葬出土的折肩银罐、金带饰看,又具有突厥的特征。因此,这批金银器并非粟特人的遗物,而是突厥人的遗物,因为粟特地区长期受突厥统治,突厥人拥有粟特的产品属于正常现象,这是粟特银器在唐代传入北方草原地区的例证。

内蒙古博物院收藏的鎏金海棠形摩羯纹银杯,呈长四曲式,深腹,圈足,内沿以鱼子纹为地,镌刻枝叶纹,腹、底间镌一周联珠纹和花瓣纹,底心以海水为地饰摩羯纹(图五)。四曲式长杯造型和联珠纹具有浓郁的萨珊银器特征,摩羯纹又是印度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动物和佛教艺术的一种



图五 鎏金摩羯纹海棠形银杯,
唐,内蒙古和林格尔出土



图六 鎏金伎乐纹银带扣，
唐代，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出土

造像，而环带夹单点式装饰却为唐代金银器纹饰布局的特点。这件银杯应该是仿制的萨珊风格的银器。鎏金伎乐纹银带，带扣、尾正面以蔓草纹为地，间以鱼子纹，浮雕伽陵频迦乐舞图案，所持乐器分别有鼓、钹、阮咸、笛、笙、箫（图六）。“伽陵频迦”是印度梵文音译，意为美音鸟、妙声鸟。据说此种鸟在壳中时就能鸣叫，声音清婉美妙，一切鸟声都不能及。在佛教中，有的经典用伽陵频迦的鸣叫声比喻佛、菩萨的妙处，有的经典认为伽陵频迦是极乐世界净土的鸟类。而在藏传佛教中，伽陵频迦的形象为人首鸟身，寺院中常见。随着佛教文化传入我国，在器物、壁画上装饰。带饰的形状却是中原地区汉式风格，集中西文化为一体。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水磨沟口墓葬^[17]出土的罗马金币，从图案花纹及铭文看，为东罗马皇帝列奥一世（公元457—474年）时所铸。金冠饰上的鳄鱼纹，周边鑿圆点纹，在我国传统的金银器纹饰中不见，应为西方的传入品。嵌宝石金戒指，宝石上刻人像，头蓄长发，作行走状，这种戒指在古罗马、波斯地区尤为流行。银高足杯，与西安李静训墓^[18]出土的金、银高足杯相近，腹部有一道凸棱，从形制看接近于黑海地区和古罗马—拜占廷的同类器（图七）。在黑海沿岸的彼尔塔瓦市郊出土有四件金、银高足杯^[19]，在腹部有凸棱；意大利佛罗伦萨皮蒂宫银器博物馆收藏一件玛瑙高足杯，为公元9至11世纪的拜占廷产品，足部以鎏金银、铜制作，腹部有凸棱。与水磨沟和李静训



图七 银高足杯，唐代，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水磨沟口墓葬出土

墓出土的金、银高足杯相似。这种高足杯最初应该是罗马风格的器形，后被拜占廷（公元395—1453年）所沿用。由于萨珊控制着中国通往拜占廷的通道，对中国境内的高足杯的影响可能是间接进行的，故有人认为水磨沟口墓葬出土的银高足杯属于萨珊的输入品^[20]。在与银高足杯同出物中，还有罗马金币、鳄鱼纹金冠饰、金戒指、刀鞘、铜环等，原报告说：“尸骨旁没有发现棺槨等葬具的痕迹，或许是一个商队的商人暴死于路而加以掩埋的。根据死者身上携带的如圈足银杯等物品，掩埋时间，可能为隋唐时代或稍早一些。”金币是罗马列奥一世时所铸，与中国发现的其他阿拉伯时代的仿制品不同，加之金冠上的纹饰非中国风格，又有罗马特征的金戒指，而且是商人随身所带，断定为拜占廷的制品应该没有问题。坝口子村出土的四枚波斯萨珊银币，从正背面图案和铭文看，其中一枚为萨珊第十九个国王卡瓦德一世（公元488—531年）复位后所铸，另三枚为库思老一世（公元531—579年）时的铸币。在唐代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传入北方草原地区，说明中西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的密切。

新疆昭苏县出土有嵌红宝石金面具、嵌红宝石宝相花纹金盖罐、嵌红玛瑙虎柄金杯、嵌红宝石金剑鞘、嵌红宝石金戒指、包金剑鞘、金带饰、金缀饰、错金银瓶、银饰件等，定为公元6至7世纪的西突厥遗物。制作工艺采用了镶嵌、金珠细工、焊接、锤鍍、模压、抛光等技法，使器物显得厚重而风格独特。嵌红宝石金面具的眉、须、髯采用



图八 嵌红宝石金面具，
唐代 新疆昭苏县墓葬出土

分体制作成型，然后铆合，将眉毛、胡须处理成黑色（图八）。这种工艺特征与吉尔吉斯坦比什凯克出土的公元4至5世纪的金面具非常接近，也是用大张金箔锤鍍而成，双目镶嵌红宝石，鼻及两颊原有附加的装饰^[21]。嵌红宝石金剑鞘、金戒指，使用吹珠点焊和镶嵌工艺，与俄罗斯波尔塔瓦市玛拉亚·排莱西其比那村出土的公元4至5世纪的同类器^[22]风格一致。嵌宝石虎柄金杯的虎柄形式，亦见于南俄罗斯出土的公元1至2世纪的银器、陶器上。这种虎、豹柄的装饰，在波斯萨珊、拜占廷等地流行。该杯上的菱形纹在萨珊银器中不见，反而与拜占廷银器的图案接近。虎柄形制与杯体不成比例，但萨珊银器的虎柄大小与器体的比例协调，而且呈现固定化的态势。在拜占廷帝国中，有收藏虎、豹等形象手柄的习俗。如苏格兰特普雷恩出土公元5世纪的窖藏拜占廷文物中，包括两件银制的豹形雕像，研究者说其是两个银制器皿上的手柄。在英国发现的公元5世纪的胡瑟窖藏中，出土拜占廷式银制的虎形雕像，据考察报告分析，认为是大型银器上的手柄。在拜占廷潘诺尼亚省塞索宝藏中，有一件大型银罐，通体锤鍍希腊罗马神话题材的浮雕，附两个豹形手柄，豹子头侧转，前爪爬在罐沿上，后爪立于罐的

肩部，其中一只颈部带有银链，与罐口上的塞子相连^[23]。在公元6世纪中叶西突厥帝国兴起后，第一代可汗室点密就派出了以粟特人摩尼亚赫为首的使团前往拜占廷。其后几年有多个拜占廷使团来到西突厥汗廷，回国时又有相当数量的突厥使节随行到君士坦丁堡。同时，西突厥以讨伐阿哇尔人为由不断向拜占廷的东部边界拓展。在这种背景下，虎柄金杯很可能是西突厥掠夺或由拜占廷作为交往礼仪上的礼物送给突厥人的，因而该金杯具有拜占廷文化的因素。嵌红宝石宝相花纹金盖罐的花纹，与阿富汗西北出土的花朵形金饰纹样^[24]相似，与唐代金银器的桃形忍冬纹花结纹样^[25]也有可比之处，足缘的联珠纹则又具有波斯萨珊和粟特金银器装饰风格（图九）。错金银瓶的形制，与俄罗斯波尔塔瓦市玛拉亚·排莱西其比那村出土的公元7世纪的单耳圈足银壶^[26]相近（图一〇）。由此可见，昭苏墓葬出土的金银器造型、纹饰及工艺，是对中亚地区大夏、萨珊、粟特和拜占廷以及唐代金银制品的继承、综合和发展，充分反映了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与西方和中原地区文化交流、融合及频繁程度。在该地区还采集到大量的丝织品，有缀金珠绣织物、锦、绦、绮、绢等，具有中原地区的织造工艺和装饰纹样，更加说明了草原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的性质。



图九 镶嵌红宝石宝相花金盖罐，
唐代 新疆昭苏县墓葬出土



图一〇 错金银瓶，
唐代 新疆昭苏县墓葬出土

公元5至6世纪，西方地区金属制作的大型器物传入中国的数量逐渐增多，对中国金银器的制作造成很大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中国金银器的发展(图一一)。其中，伊朗高原和希腊金银器中的浮雕图案对唐代陶器的装饰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类似的陶器在北方草原地区的唐墓中多有发现。如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南园子墓葬^[27]出土的釉陶器，器种有塔形器、凤首瓶、高领穿带罐、器座，这四件釉陶器上的宝相花、兽头、花



图一一 乐伎八棱金杯，
唐代 陕西省西安市何家村窖藏出土

饰等都采用了贴塑工艺，呈现出浮雕的效果，这在中亚地区的银器上都可见到，明显地具有西方文化的因素。所以说，西方国家的银器不但对中国金银器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还改变了中国陶瓷器上的传统装饰，使纹样由纯中国式的花鸟山水类转变为外国式的动物、人物浮雕和花卉类题材。

从总体上看，隋唐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繁盛时期，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却是文化繁荣的前奏期。当时，突厥主要活动于草原地区，在促进中华文明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地处草原丝绸之路的东端，在势力最强大时曾经扩张到草原丝绸之路的西端，反映在文化方面把拜占廷、伊朗、印度和中国这四大文明联系起来，充当了东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传递者，并将不同文明融入到自己的文化中，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文化内涵，包括金银器的造型艺术，为后来草原民族金银器的鼎盛与发展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创造了更多的有利条件。

项目来源 2011 年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与技术研究课题《金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研究》的阶段成果(合同编号 20110116)。

[1] 丁学芸《布图木吉金带饰及其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463~473页。

[2] 喀喇沁旗文化馆《辽宁昭盟喀喇沁旗发现唐代鎏金银器》,《考古》1977年第5期,第327~334页。

[3]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墓发掘简介》,《文物》1961年第9期,第30~33页。

[4] 李长庆等《西安北郊发现唐代金花银盘》,《文物》1963年第10期,第60页。

[5] 樊维岳《陕西蓝田发现一批唐代金银器》,《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1期,第46~51页。

[6] 陆九皋、韩伟《唐代金银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图118。

[7] 王维坤《试论日本正仓院珍藏的镀金鹿纹三足银盘》,《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5期,第47~63页。

[8] [后晋]刘昫撰《旧唐书》卷174《李德裕传》,中华

书局点校本,1975年。

[9]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耀县柳林背阴村出土一批唐代银器》,《文物》1966年第1期,第46~49页。

[10]吴玉贵《高昌供食文书中的突厥》,《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

[11]E.Charancs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1933年。

[12]安新英《新疆伊犁昭苏县古墓葬出土金银器等珍贵文物》,《文物》1999年第9期,第4~15页。

[13]敖汉旗文化馆《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金银器》,《考古》1978年第2期,第117~118页。

[14]夏鼐《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考古》1978年第2期,第111~116页。

[15]Guity Azarpay, Sogdian Painting.The pictorial Epic in Oriental Art.1981.

[16]陕西省博物馆等《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文物》1972年第1期,第30~42页。

[17]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博物馆《呼和浩特市附近出土的外国银币》,《考古》1975年第3期,第182~185页。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城郊隋唐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19]东京国立博物馆等《シルクロードの遺宝》,日本经济新闻社,1985年。

[20]夏鼐《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考古》

1978年第2期,第111~116页。

[21]I Art De l'Asie Centraie,图版196.Editions d'an Aurora Leningrad 1988,Publication en France,Aurore'Editions d'art Ars M unclipne' et Relie en Finlande.

[22][日]江上波夫监修,日本东方博物馆、朝日新闻编集《南俄罗斯骑马民族遗宝展》图录,朝日新闻发行,1991年。

[23]林英《新疆波马出土的虎柄金杯中的拜占廷因素》,《艺术史研究》,第3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21~437页。

[24]V.I.Sariancli著、加藤九祚译《丝绸之路的黄金遗宝——西伯尔甘王墓发掘记》(日文版),岩波书店,1988年。

[25]韩伟编著《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年,线图120、203、206。

[26][日]江上波夫监修,日本东方博物馆、朝日新闻编集《南俄罗斯骑马民族遗宝展》图录,朝日新闻发行,1991年。

[27]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和林格尔县南园子墓葬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519~524页。

(作者系大连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上接20页)

官,到万历二十六年、二十七年两次以推官署襄阳府、鄢阳府台印,即代理知府。所以自称“鄢阳署印官”。乔应甲于万历二十七年以治行优等被征召入京升迁,却因不送礼而惹恼当权者而在京城候旨三年。这期间,恰好碰上家乡大旱与太监陈增陈奉等以矿税特使身份到全国各地大肆

掠取豪夺,横行霸道,搞得民不聊生之时,乔应甲满腔激愤,奋笔疾书,写下了这首律诗,倾吐了忧国忧民嫉恶如仇的一腔热血。

由此可证,最晚在明万历年间,鄢阳一词就已经通用了。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省临猗县博物馆)